



嘉绒往事

丹巴方言

◎杨全富

丹巴,地处甘孜州东部,五条山脉,五条河流将丹巴的地形地貌勾勒成蔚为壮观的漩涡状,如一朵绽放的莲花。由于县境内沟壑纵横,且县城境内有五条河流将村落隔绝开来,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区域及风俗习惯,也才有了“五山五水绘莲花,一族四语传妙音”之说。

据史书记载,公元638年,吐蕃攻破吐谷浑后,相继占领党项、白兰、附国、嘉良夷等地区,并从四大部族之一的扎族中招募大批士兵和移民“驻大渡河一带”。此后,今县境及周邻部落居民与吐蕃军队和移民,因频繁的交往而融合,最终,形成具有强烈地域和语言特色的藏族。丹巴县境内的藏族由于所处地域和所使用方言的差别,按语系分,共有四大方言土语群区。

一是嘉绒语,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的群落主要聚居在丹巴县巴底镇全部、巴旺乡一部,半扇门镇大部、太平桥乡大部。人口约10000余人,占全县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左右。使用这种语言也有不同的称谓,在今丹巴县巴底镇一带,称这种语言为“嘉绒萨呷”,而在小金谷中则称为“赞拉萨呷”。二是尔龚语,也称为革什扎语,主要分布在丹东镇大部、革什扎镇全部、巴旺乡大部、聂呷镇全部和东谷镇大部。人口约12000余人,占全县藏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左右。三是康巴语,即二十四村话,主要分布于东谷镇一部,章谷镇、墨尔多山镇、梭坡乡、格宗乡全部和半扇门镇一部。约有人口14000人左右,占全县藏族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七左右。四是安多语,境内主要从事游牧的人员,当地俗称为牛场娃。其语言属于安多语系,故又被人们称为安多娃。主要聚居在丹东镇、巴底镇、革什扎镇、东谷镇、半扇门镇和太平桥乡境内,在这个区域居住的人们也能讲附近的农区语言。

格桑曲批：汉藏翻译领先者

(上接第五版)

在格桑曲批的所有著作中,不得不提的是《更敦群培文集精要》。该书是格桑曲批所译中难度最大的。众所周知,更敦群培,是20世纪著名的学术大师、启蒙思想家,其文集的深奥可想而知。且古藏文和现代藏文,也是有差异的。不过,按过省藏研所的任务后,格桑曲批没有退缩,他在我州著名学者钦绕色老师的帮助下,用了8、9个月时间,完成了包括《智游列国散记》《白史》等在内的《更敦群培文集精要》。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民委主任扎西泽仁为该书写了序言。而《更敦群培文集精要》也获得了省政府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除精深的典籍外,格桑曲批还有通俗易懂的著作。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大小两个版本的《学说藏语两千句》。该书大版本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重印12次,小版本已重印7次。随着“西部大开发”,到西藏地区做生意、旅游的中外人士越来越多,都希望学到一点常用藏语。一天,一好友对格桑曲批说,中国人到国外打工、做生意,为了突击英语,会买一本巴掌大的汉英对照口袋书。那么,为什么他不可以仿照该书,编一本常用的藏语书呢?格桑曲批觉得有理。他将常用藏语归纳了五百句,编译了一本《学说藏语五百句》,此书一出版,便很快售罄。之后,学校领导根据基层干部学习藏语的需要,指示编译《学说藏语两千句》,一年后该书出版了。没想到,这本书大受欢迎,成了畅销书。

填补空白、开拓创新,格桑曲批不仅对我州藏文化传承做出贡献,且对汉藏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翻译之余,他还撰写论文。其中《甘孜州格萨尔风物遗迹传说》获

据统计,全县使用该语系的有1000余人,占全县藏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左右。

在丹巴,这四种藏语方言中,即使同属于一种方言区的,语调也有所差异。究其根源,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交通不便而形成了这种差异性。如二十四村话,使用这种语言的藏族村落,只要是村落与村落之间没有河流的阻隔,人们所使用的藏语方言语调几乎一致。如东谷镇的纳交村、章谷镇的长纳村、白呷村,梭坡乡的普格顶村,格宗镇的格宗村、竹子沟村等,因为同属于一条山系,且其间有古道将这些村落连接起来,因此所使用的二十四村语语调基本一致。而与之隔河相望的中路乡的罕格依村、中路一村、二村等,以及梭坡乡的几个村寨,虽然为同一种方言,然而语调却有很大的区别。在调查中发现,造成这种语言差异的原因是其间有大渡河的阻隔。在解放前,大渡河因为河面宽阔,架设桥梁难度极大,人们过河时,都需要乘坐简易的羊皮船。这种羊皮船在湍急的河流之中极易颠覆。为此,人们很少涉险渡河,造成居于两岸的人们虽使用同一语系,但调式却有着不同之处。如“睡觉”,梭坡话为“且煞给”,而蒲角顶话为“煞宁给”。还有如革什扎河峡谷两岸,这里的人们都使用尔龚语,语调没有太多的差异。究其根源,在这一条峡谷之间,革什扎河流并不像大渡河似的湍急,水流量较小,河谷也不宽阔。因此,在这一条河流上,建有多座伸臂桥,交通极其便利,便于河谷两岸人的交流联系。因此,语言的声调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与其相隔一座山梁的甲居镇及巴旺乡,由于其间的山脊高大且险峻,阻碍了人们相互交流的通道,语调有较大的区别。如“你到哪里去”,甲居镇和巴旺乡的人这样说“那而想想”,而革什扎话则说“罗托儿行”。又如“你慢慢走”,甲居镇

和巴旺乡的人这样说“西西阿得哦”,而革什扎话则说“西西阿得波”。从中也可以看出,甲居镇和巴旺乡的人们在使用尔龚语的时候,其调式与革什扎河谷两岸人们使用的尔龚语有着一定的音调区别。

在丹巴县,也有一些被其他语言包裹起来的孤岛。如半扇门镇使用藏语方言二十四村语的梅龙大邑村,在他们的四周居住着使用嘉绒语的人们,显得鹤立鸡群,也着实难能可贵。为了一探究竟,笔者曾多次走进这两个村寨里。据当地的老人们讲,古时候,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火,扶老携幼逆小金川河谷而上。当他们来到关州后,看见烂水湾对岸峭壁耸立的后面,有一条纵深的峡谷。峡谷间,鸟语花香。于是,他们走进这条沟谷内,在此定居下来。究其根源,他们应该与中路、纳顶村寨的人们同属于同一部落的群体。千百年来,他们为了守住自己的根,只允许在族内通婚,将语言及风俗习惯完整地保存下来。不过,为了能在这里更好地生存下去,他们又不得不遵从所在区域的风俗习惯。为此,他们讲着二十四村话,却使用嘉绒藏语方言跳锅庄舞。

其次,解放前民众所属行政区域管辖地域范围也是造成语调差异的原因之一。如丹巴藏语方言嘉绒语,是至今仍保留古藏语拼音成分和拼音方式最多的藏语方言。境内主要分为两大区域。一是巴底嘉绒语区域,为当年巴底土司管辖范围。二是宅龙嘉绒语区域,为当年宅龙守备、千总管辖范围。宅龙守备、千总管辖范围有“得坡勒宝时诺,耶让时度”的称谓,译为“鸡心碉以下,岳扎以上”。在丹巴,这两种语言区域虽然同属于嘉绒语,但是语言的调式却有较大的差异。在小金谷中,使用嘉绒藏语的人,对身份高贵的人,吃饭时说“得你萨尔谷”,对长辈则称为“格撒谷儿”,对一般人则称为“得若达

化释义》中的道孚、康定、巴塘、甘孜卷和《德格土司传》。

肆

大约三个小时后,在格桑曲批老人的书房里,记者结束了采访。

老人的书房里,全部都是书。他和老伴,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到泸定过冬。临行了,老人要拿的,依然是他还未译完、还未审毕的手稿和常用书籍。而在采访时,老人的夫人适时地送来茶水。夫人的关怀、体贴,也是老人安心做学术的关键。

格桑曲批老人笑着对记者讲了一件趣事。2016年,中央电视台在康定举办的“情歌声”上他们老两口和其他三对夫妻被请上舞台,当主持人问:“您二老直至金婚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秘诀是什么时?”他回答:“要说秘诀有三条,一是工资全部上交;二是吃饭穿衣都不挑;三是出门回家都报告。”话落毕,引发了全场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有了温馨的家,坐在书房里,格桑曲批老人就感到心安;觉得充实。每当写完一篇文章,审毕一部著作,他会由衷地高兴一阵,休息半天之后,又投入新的工作。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做学问须勤奋,须认真,屁股和板凳相结合,眼睛和书本相结合,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才能有所作为。他借用一位名家的话说:“大凡大年初一,能读个把小时业务书籍的人,此生必获成就。”在学期间,老人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灵的最终归处。

经历了坎坎坷坷,经历了风风雨雨,老

绝不能被一株草打败
她向手心吐口唾沫
又换个姿势

张开双唇陪天空说了一会儿
太阳红着脸
背对母亲看她扯出稗子把我弄哭

党史随笔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怎样算出来的

◎钱国宏

在学习党史过程中,人们经常会提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很多读者纳闷:长征途中,情况和环境那么复杂、多变,这“二万五千里”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里程并非在地图上测量出来的,更不是凭空编造的数据,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主力8万多人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从瑞金一带出发西进,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红军顺利突破三道封锁线,但湘江战役遭受严重损失,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6月,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此后,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中共中央对其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实现了战略大转移。1936年10月9日和22日,共同北上的红四、红二方面军分别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而我们平时常说的“二万五千里”,指的就是中央红军的行程。

长征中,很多红军干部有写日记的习惯。时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萧锋较为完整地用日记记下了长征的过程,内容既包括每天的天气、行军路线、作战行动、人员伤亡、弹药消耗以及俘虏缴获,也包括当天的行走路程、所到地点等。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进行了初步总结,并根据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直属队长征行程表及亲历长征的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等人的长征日记,逐一汇总计算出了长征的总里程。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长征“二万五千里”的数字。1935年10月,他在吴起镇讲话时说道:“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军)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此后,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等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至此,中国革命历史上就正式有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

近年来,很多人以“重走长征路”的形式对这一里程进行考证,并对“二万五千里”提出了质疑。其实,这种质疑毫无道理。其一,长征途中,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其二,红军边行军边作战,边筹款筹粮边开展宣传工作,往返里程倍数增加。其三,长征过程中,红军因缺少地图,走错路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红军长征的行程。其四,现在重走长征路人所走的路线主线与红军当年长征时的路线相同,但却无法抵达红军各部队经过的每一个具体地点。其五,长征已过去80多年,当年的道路状况也已发生诸多变化,重走长征路的人已不可能再完全走同当年的同一条路。因此,用现在“长征”的里程来计算、验证当年红军走过的“二万五千里”,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今天学习党史,了解长征,不能细究某一个“细枝末节”,而应把目光放在长征精神上。中国工农红军当年所创造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其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的。我们要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吸取并转化长征的精髓,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